

埃德加·斯诺跨文化之旅探究

刘 洪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 洪(1963-), 男, 河北阜城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博士生, 广西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

[摘 要] 从跨文化角度剖析埃德加·斯诺当年的冒险之举, 对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无疑有着诸多的借鉴意义。就斯诺来说, 他的文化跨越取得了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多重收获: 主观上, 不仅满足了他自己的冒险和好奇之心, 而且使他一举成为世界级的著名记者; 客观上, 它为红色文化由西北一隅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还为未来的中美两国文化的正常交流搭建了桥梁, 也使自己由一个文化吸收者变为文化贡献者。

[关键词] 跨文化; 文化价值观; 文化休克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101-07

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日益频繁的今天, 各种文化之间的吸引、交融、渗透和竞争已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 文化间的误读、摩擦、碰撞和冲突也无时不在。在斯诺诞辰 100 周年之际, 探讨他的跨文化之旅, 缅怀他并学习他不畏艰难困苦、忠于客观事实的独立文化意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为文化间的沟通 and 理解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是世人的楷模。

鉴于文化的复杂性且定义就多达 164 种^[1] (第 28 页), 本文对“文化”的概念作如下界定: “文化是一种学得和传承的自动反映, 是习惯、观念、价值以及由之而导出的行为”^[1] (第 29 页)。

一、从美国文化到中国文化

(一) 通过寻找文化环境来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1928 年, 23 岁的斯诺在其探险欲望的驱使下, 开始了他富有“探险”风格的跨文化之旅。从美国文化到中国文化 (其中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文化和陕北的红色文化), 他通过寻找客观文化环境, 一步步朝着自己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逼近。

美国养育了斯诺, 美国文化塑造了斯诺, 从而使他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文化价值观, 其中包括热爱冒险、远方情结、平等、博爱和个人主义等。来中国 7 年后, 他的文化特质中由基督教文化传承而来的“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又让他骚动不安, 驱使他进行新的探索与跨越。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的文化景象令他的灵魂无比痛苦, 冒险给他所带来的短暂满足很快就被强烈的痛苦所掩盖。这里“到处是贫穷、无知、污秽、残暴、冷漠、混乱和普遍的绝望……我所知道的‘当政’的寡头和少数贪婪的占有集团, 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都是腐败堕落的”^[2] (第 213 页)。他像一头猎豹, 时刻都在寻找着新的机会, 一旦觅得, 他就毫不犹豫地再次跨越。当他得知中国西北还有另一种不同于国统区的红色文化时, 他铆足了劲, 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探索。而这次跨越几乎满足了他所有的文化追求, 包括热爱冒险、远方情结、平

等、博爱和有限的个人主义。正因为国民党对红色文化进行了长达 9 年的封锁、歪曲、诬蔑和压制,红色文化经过国民党“宣传魔镜”的放大,在世人眼里成了“杀人越货”的“魔鬼”。所以,当斯诺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将红色文化还原回正常状态时,立刻引起了轰动。可以说,美国文化铸造了他的文化特质,而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文化又无法满足他的全部文化特质,尤其是 1931 年他在上海目睹了爱国青年柔石等 5 人被当局杀害,以及其他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深深刺激了斯诺,也让他认识了白色文化极其丑陋的一面,促使他下决心去看看与白色文化对立的红色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在中国呆了七八年了,虽然满足了当初的冒险愿望,但他在事业上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众多的外国驻华记者中,比他来得早、比他有名气的大有人在,像端纳、鲍威尔等人,可以说已经融入了国统区文化的主流,而他仍处于边缘位置。他更不可能像学者费正清那样靠扎实、深厚的汉学学术功底走向成功。他只有去寻找独家新闻,一举成名。正因为他无名,没那么多顾虑,反而有利于他去冒别人不愿冒之险,探索新的领域。无名者失去的只是无名。正是这次文化跨越极大地实现了斯诺的人生价值追求,也使他的文化由单纯的个体文化变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之一。

斯诺对自己文化特质中包含有“平等、博爱”的内容是清楚的,但他对自己苦苦追求的就是这 4 个字却不是十分清醒和自觉,而是在实践中一步步逼近自己文化价值的核心,一步步弄清了自己的根本追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实践中看得很清楚。如果他追求物质享受,他就没有必要只身一人跑到大洋彼岸来。因为 1928 年的美国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时期,他在美国本可以过着优越的、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生活。退一步说,他来到上海后也可以过着白种人的舒适生活,没必要再东奔西跑。按他最初的动机,完全可以只写些纯粹的游记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异国的风俗习惯、奇珍异宝,没必要一个劲地写“扒粪”似的“负面报道”。当然,在国统区他也找到了他文化特质中的部分知己因素,如热爱冒险、远方情结和有限的个人主义。而当他到了物质条件更落后的陕北后,他反而不写那里的落后与贫穷,而是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红色文化的思想价值、精神面貌大加赞扬:“共产党人却与他们(指国统区的执政者)形成了对照,他们都是些正直、无私的人……随时准备为他们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把这一理想看得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2](第 213 页)。在这里,他最大限度地找到了他的文化知己,尤其是“平等、博爱”这一部分文化特质,引起了斯诺的强烈共鸣,将自己的认同与称赞放在对客观事实的选择和叙述中。

多数人是通过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来适应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斯诺则走了另一条路:通过选择环境来寻找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吻合的文化。他的每一次跨越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内在文化的认可,享受着文化的奖赏和乐趣。纵观斯诺这段时间的文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斯诺从美国到中国再到陕北的跨越中,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满足明显地呈现出一降一升的运动轨迹:物质生活是步步后退,依次递减;上海不如美国,陕北不如上海,农村不如城市;但他精神世界的认同与满足程度却随着他从东往西的跨越在步步增加,依次攀升;中国满足了他对冒险和远方情结的追求,但国民党搞的白色文化却与他内心的文化特质无法耦合。陕北除了满足他的冒险和远方情结之外,还耦合了他的“平等、博爱”的文化价值观,其精神世界对红色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与满足。“他们(指共产党)热情提倡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坚持民族平等,对未来抱积极态度,因此感到我与他们有共通之处……他们最吸引我之处就是他们断然否定神秘主义和使穷人失望的神仙,而相信人的力量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2](第 213-214 页)。而这正是斯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后来,当斯诺到世界红色文化的大本营苏联采访时,彼此都失去了“第一次”,他做的报道也就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斯诺和中国的红色文化相遇,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幸运的。只有那些文化特质和红色文化相似或相近的记者才有可能积极主动地去找红色文化,才能和红色文化产生强烈共鸣。比如,早在 1934 年 10 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夫妇(中文名叫薄复礼)曾无意中闯入红军队伍,被迫随红军长征 560 天,行程达 6000 英里。获准离开红军后,1936 年 11 月,他根据自己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在伦敦出版了《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一书。但是,勃沙特的作品反而没有比他晚一年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就是双方的文化价值观存在较大的距离,斯诺是主动寻找红色文化,勃沙特是被迫跟随。仅此一点,就可以

决定作者对事物的判断。美国文化教育了斯诺23年,中国文化又熏陶了他8年,为酷爱冒险的斯诺做好了成功的先决条件,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二)通过交友加深对东道国文化的认识

斯诺不仅通过跨越大的文化环境来追寻内心的文化价值,还通过交友的方式来加深对东道国文化的认识。作为记者,与社会各界人士结交是职责所在。但能否产生共鸣、成为知音,则是双方的价值观在起作用。斯诺庆幸自己很早就结识了宋庆龄,是宋庆龄消除了他的蒙昧无知,使他“体验到了中国的最美好的思想和感情”^[2](第98页)。而在这之前,斯诺所采访过的蒋介石、孙科、孔祥熙等人并没有和他产生共鸣,他只是完成了一个记者的例行采访任务。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从一个异文化进入到东道主先进文化的内核,使他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因为宋庆龄经常介绍斯诺“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青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这其中斯诺就认识了鲁迅。“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斯诺对鲁迅给予很高的评价,把他比作中国的高尔基和契诃夫。通过和鲁迅等文化大师的交往,斯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尽管我没有资格向中国索取什么东西,中国却占有了我身心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文化特质经过多年的浸润已经融入了斯诺的血脉之中,他感到自豪的是“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在碧绿的梯田中间……留给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军饷、忍饥挨饿的农民士兵们,他们的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使一切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3](第293-294页)。1941年,对斯诺有着深刻了解的宋庆龄劝他留下来,并预言:“你会回来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4](第295页)。

人生犹如车厢里的货物,它在旅途中总要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货物靠运送过程中的外力通过颠簸来调整,而人则是靠内在的文化追求来完成自己的选择。这一点在斯诺身上尤为突出,他之所以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一跨再跨,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其核心文化驱使他要为自己的文化寻找一个最佳位置。当他到了陕北,红色文化与斯诺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合力,共同将斯诺的记者生涯推向了顶峰,在全世界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二、从文化休克到超前的文化意识

(一)文化休克

斯诺初来上海,文化差异在所难免,远方情结中的上海与切身感受到的上海完全是两回事,从“形而下”的肤色、服饰、建筑、饮食、钱币和文字,到“形而上”的语言文化、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斯诺一下遇到了每一个外国人都会碰上的文化休克。在斯诺眼里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模样,是一个没有什么个人特征的庞大的人群,但有颜色、行动,充满了矛盾”^[2](第17-18页)。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观,是“先追求个人的人格完美,不仅求外在的美的表现,而且是从内在的‘正心’开始”^[3](第196页)。对此,斯诺更是一时无法体察。他最初对中国的文化体验是:“他们书写从右到左;他们是姓在前,名字在后;同人打招呼,不是招手,而是挥手,好像是让人走开;告别时不握手,而是把手拢在衣袖里;削苹果皮是刀口冲外,而不是冲内;锯木板时,把锯齿向内拉,而不是向外锯;发纸牌是从右到左;先吃饭,后喝汤;还有,他们想说‘是’时却说‘不’”^[2](第17-18页)。对此,斯诺“很难立即理解”^[2](第18页)。古老的东方文化在给他带来新鲜好奇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扭、诧异和困惑。但他并没有急着走进东方文化的内核,他了解东方文化的方式一是游访,利用记者的身份,四处调查、体验;二是翻阅《密勒氏评论报》总编辑鲍威尔所收藏的英文版的汉学书籍。

当然,这时的上海是文化大杂烩,它既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亚洲第一大城市,也是不设防的冒险家的乐园。美国人如果仅仅生活在它的小圈子里,可以过得很滋润,“因为上海同一些其他事物一样已经美国化了。在这里,美国人可以找到家乡的许多使生活舒适的事物”^[4](第347页);歌星、无线电、爵士乐队、鸡尾酒和夜总会等。初到上海,斯诺尽管遇到了文化休克,但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的初衷是来游

历的。此时,他还没有想到完全融入这个文化中。可以说,他抱着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着东西文化的差异。

这个时期的斯诺,在上海过着相当舒适的物质生活。据斯诺回忆,他的一位朋友约翰·阿里森每月的薪水是 600 元,比他还少,“但这些钱已足以使我们保持白人的威严”,因为日常生活所需费用很低,“不管你坐出租汽车到哪里,都只需要付一元钱,相当于 30 美分。在美国俱乐部或‘吉米’饭馆吃一顿最丰盛的美式饭菜也只花一元多一点”^[3](第 20 页)。这样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当惬意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斯诺不学汉语就不能深入了解东方文化。而是说,一个外国人如果一直在语言形式上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心态,那他和东道国文化就会存在着一种更加明显的文化隔膜,妨碍着彼此间的交流。

(二)超前的文化意识

来华后,斯诺在阅读中发现了“古老”的含义,看到了古老的中国正在竭力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他到中国后,碰上了千古未有的奇变中的东方文化,在欧风美雨的剧烈撞击下,中国呈现出世界独有的文化色彩:就文化的“器物”层面来说,中国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比如坚船利炮、铁路、电器等;就文化的“制度”层面来说,中国也开始试行西方的民主政体,如建立共和制、实行选举制度等;就文化的“理念”层面来说,儒家文化在痛苦地消化着西方文化(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着)。中国当时普遍存在的人间悲剧、血腥残杀和民族存亡等问题,纷繁杂呈,几乎囊括了人世间所有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更令人神往的是,这些真实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因如此,斯诺才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初衷,而到内蒙古萨拉齐采访饥荒所亲眼看到的“悲惨”,比他少年时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所体验到的“悲惨”不知要强烈多少倍,500 万人被活活饿死。面对如此惨烈的人间悲剧,斯诺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3](第 2 页)。这种转变加快了斯诺的文化跨越,由一个异文化的泛爱者转为具体的行动者,除了用笔杆子帮助中国人民以外,他更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策划并参加了“12.9”运动、帮助邓颖超逃出失陷后的北平和参加创办了造福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工业合作组织”。

觉醒后的斯诺不再抱着一种游历的心态看待中国文化,专门请了老师学汉语,达到了“应用”、“交谈”和“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章”的程度^[3](第 152 页)。斯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掌握使他在文章中能够娴熟地予以运用,如在《复始之旅》的扉页引用庄子《秋水》,作题解的点睛之笔:“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消息盈虚,终则有始”^[3](扉页)。类似手法在斯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又如他在《南部前线》一文的题解中引用了孟子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第 70 页)。加上他广泛深入实地考察、勤于思考,使他每每在重大问题上都能预先做出自己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曾经让斯诺困惑的文化休克已然化解,胸中的美国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乃至东方文化和国际政界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成了他分析、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针对当时国统区颇为推崇的法西斯主义,斯诺认为:“中国不可能产生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和欧洲完全不一样。他断言中国“要么进行深刻改革,要么灭亡”。结果的确如此。但是,“蒋介石想要有绝对的权力,并不真的想改革一切”,“打心眼里想要阻止改革”,“他从来不懂得,他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自他自己的营垒。”斯诺认为,“蒋介石并不坚决,而是顽固;并不聪明,只是陈腐;并非严守纪律,而是受到抑制;并无创见,只知厚古”^[3](第 163-164 页)。

针对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以为“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就会向苏联进攻,斯诺早在 1936 年就认为:“我对日本人在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行动作了研究和观察,我深信,日本侵占中国的目的并非为了向俄国开战,而是想以中国为根据地,向整个欧洲的殖民体系发起总攻”^[3](第 180 页)。1936 年 6 月,斯诺在《远东即将发生的冲突》一文中预言:“日本在竭力占有中国市场和内地财富的过程中,必将折断帝国的颈骨。这一灾难之将发生,并非由于日本经济会自动崩溃,而是因为日本必然要强加于中国的宗主国将令人不堪忍受,并将很快引起震撼世界的抵抗”^[2](第 181 页)。不仅如此,斯诺看得更远,他进一步分析道:“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而我个人反对这样做。我此时也明白,即使我们打赢那场战争,我们也不能够决定中国的未来”^[2](第 180 页)。他接着分析道:“惩罚日本的责

任不可避免地要落在社会主义苏联的肩上……也许火线落到美国 and 英国人的头上”^[2] (第181页)。对这些真知灼见,西方国家的决策人物却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中国决不会共产主义化,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太严重,中国人决不会投入战争。中国人基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谁也不会把苦力训练成士兵。“他们期望日本在与中国的争端中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然后,转而进攻俄国”^[2] (第181页)。1941年7月,就在希特勒侵略苏联节节得手之际,斯诺就判断希特勒侵苏是走上灭亡之路;皖南事变前,斯诺在香港向美国发电,认为国民党军队将向新四军发动进攻,结果不幸言中。也正因为报道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取消了斯诺的采访资格,斯诺才被迫回国。1943年10月,他推测苏联和日本不免一战;1948至1949年他曾预言,“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统治的中国终将脱离俄国的轨道”^[3] (第370页)。历史用事实一再证明了斯诺的洞察力。“卓越的艺术家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宗教的创建者,这些人物的价值常常是各自酝酿的。在他们的价值尚未得到众人了解与接纳时,他们的价值只是属于个人的。于是,他们受到冷漠,有时甚至受到迫害”^[1] (第77-78页)。正因为斯诺坚持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友好相处的意识超出了美国当局者的认识,无法被接受,导致他长期被排挤,被边缘化。1972年2月21日,就在斯诺去世6天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再次印证了斯诺的正确性。

20世纪40年代初,斯诺对世界秩序的设想是“世界民主国家”大联盟,提出获得解放的殖民地,借助西方的投资,共同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斯诺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要求美国超越帝国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纯正的社会和政治民主。他认为,美国“想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塑造世界,特别是亚洲”^[3] (第308-311页)。当今世界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斯诺的这些见解。

三、独立的文化意识和独特的文化桥梁

(一) 独立的文化意识

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又3次来访,他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也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身份,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不管是对国统区文化还是红色文化,抑或是美国文化,他都保持自己的见解,决不轻信。他尽自己所能努力保持新闻的客观、真实,因为被文化同化后会蒙蔽人的视线,影响判断。这从“情人眼里出西施”可以得到反证。他每次来华访问,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因而拥有令西方记者羡慕的政治资本,但他对红色文化的异端形态抱着了解、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对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提出异议。毛泽东反驳斯诺,“大搞个人崇拜的正是你们美国人”^[5] (第394页)并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名字为证。当时,大概也只有斯诺敢这样对毛泽东提意见了。毛泽东并没有责怪斯诺,反而邀请他登上天安门观看国庆大游行。

面对文化大革命,自以为对红色文化颇为了解的斯诺感到困惑、迷茫和焦虑,为弄清事实真相,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来华采访。当他对文革有了切身的认识之后,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在一个靠着把领袖神化的“日益显赫的新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6] (第322页)。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天平将会调整过来”^[7] (第324页)。正因为他始终不被哪一种文化所蒙蔽,他写的报道才具有无可置疑的公信力,才赢得中外读者的信任、信赖和信服。可以想象,假如斯诺从属某一党派,政党在为他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也为他戴上了眼罩,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公信力,而这正是新闻最宝贵的生命。绝对客观公正的报道是不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地去报道,这对一个记者来说尤其可贵,长期坚持更属不易。斯诺正是坚持这一点才赢得中外读者的信任。

斯诺这种文化独立意识由来已久,心中始终装着美国读者,始终以美国读者的接受能力来诠释中国的新闻事件。在斯诺进入陕北保安的途中他写道:“我当时的感觉或许应当与麦尔维尔的《泰比》一书中的水手们在弃船进入食人的禁地时的心情一样。但是,我并没有这种感觉”^[2] (第186-187页)。他形容毛泽东“看上去很像林肯”,形容徐特立是“圣诞老人”。可以想象,当美国读者看到这样的报道时,其文化亲和力得到了大大加强。

(二)中美文化的独特桥梁

斯诺陕北之行在揭开了他心中谜团的同时,也架起了将红色文化通向国人乃至世界的桥梁,他以正直、诚实和独立见解赢得了桥梁两边人们的欢迎。现在回头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作为特殊的“桥梁”没有变,然而桥梁两边的文化价值观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桥梁这边的红色文化由西北一隅传向了全国,昔日的“赤匪”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执掌了国家政权;桥梁那边的杜勒斯之辈却不愿承认这个铁的事实,宁愿自欺欺人。面对这种局面,斯诺焦急而无奈,只有等着历史这位老人的到来。

然而,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个弯:红色文化走向了异常,曾经受欢迎的《西行漫记》成了禁书,他的客观报道成了“丑化”领袖的罪证。红色文化一度将斯诺打入冷宫。而生他养他的祖国由于受“冷战”的影响,导致麦卡锡主义盛行,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宣传员,将他列入黑名单,一度连他的夫人洛伊丝都受影响。此时的斯诺陷入人生的低谷,不仅生活拮据,更重要的是曾经给他带来巨大成功和荣誉的跨文化之旅成了他痛苦的根源,桥梁两边的文化都撤走了桥墩,只是双方撤的程度和时间长度不同。此时,美国文化的兴奋点是谁“丢失了”中国,还要挖出所谓中国的代理人,对斯诺提出“一个革命的、然而又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符合美国更长远的利益”的观点不再受欢迎;而红色文化对他那种“铁托式”的观点也不欢迎,因为当时采取的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政策。斯诺感到他“在所有的阵营,都是‘不受欢迎的人’”^[5](第 350 页)。1960 年,红色文化纠正了对他的偏差,双方再次携手合作。而桥梁的另一边却弃之不理,没有认识到斯诺已经不属于任何集团甚至他个人,而是属于中美两国文化。

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斯诺终于被允许到大陆进行采访。1960 年,他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进入大陆的美国记者。但此时,双方对他的称谓有了微妙的变化:北京称他为作家,华盛顿称他为记者。此次,深入红色文化内地采访的困难,不亚于当年陕北之行,不仅美国当局阻挠他,红色文化对他的申请,起初也不像当年那么热情。不管怎样,斯诺有了破冰之旅。他将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告诉美国人民,努力消除双方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造成的误会和曲解。为此,他在行文中努力保持客观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一改他当年在《西行漫记》中所表现出的对红色文化带有强烈赞赏的叙述方式。因为此时任何对红色文化的赞赏都会刺激美国当局已经无比郁闷的胸膛,对双方的和解不利。他除了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外,先后到达 19 个重要城市和 11 个公社。斯诺回国后在美国高校等地做了 38 场演讲,两年后他又根据此次采访写成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向美国各界介绍“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将红色文化想改变双方关系的良好愿望传递给美国人民。

1970 年,斯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他站在红色文化的最高位置协助红色文化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红色文化的最高掌舵人进行了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合影,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栏内刊登了一句话:“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这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愿意和美国缓和关系。但那些“粗糙的西方大脑”对此却熟视无睹^[5](第 406 页),完全没有理解其中的涵义。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红色文化,早就忘了斯诺。后来斯诺将《同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在《生活》杂志上全文发表出来,将毛泽东的观点公布于众,“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8](第 436-437 页)美国通讯社在刊物发表前抢先刊发了这篇报道,华盛顿这才恍然大悟,立即作出积极反应。这才有了基辛格的秘密来华和尼克松的来访,中美两国终于开始走向和解。斯诺也最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毛泽东认为他和斯诺几十年来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9](第 369 页)。尼克松在访华之行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他的年度报告,对斯诺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的报道证实了我们已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9](第 369 页)。令人遗憾的是,斯诺没能亲眼看见他毕生致力传播的红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和解。

综上所述,斯诺的跨文化之旅是从他少年时期就形成的文化特质——冒险开始的,这也是其文化特质中最基本、最外围的组成部分,与其孪生的还有远方情结及个人主义,核心部分则是平等博爱。其跨

文化之旅犹如剥笋,从最外围的冒险到核心的平等博爱,从美国到中国,从国统区到陕北,地理上的两次跨越,给他精神上带来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跨越,满足了他文化特质中的外围部分的需求。第二次跨越,则在他的文化内核找到了知音。红色文化的精髓和魅力与斯诺文化特质的内核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两者的合力将他的事业推向顶峰,双方携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可惜,斯诺当时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不然,他不会在共产党(红色文化)和国民党(白色文化)以及日本侵略者(帝国主义文化)在华夏大地进行殊死较量的关键时刻离开中国,错过了更多的冒险机会,错失了更多的精彩报道,也错过了亲眼目睹红色文化由黄土高原红遍中国的大好机会。当他回到美国遥望中国时,他才强烈的感受到跨文化交流是他的事业,对红色文化的了解是他的突出特征。正因如此,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文化视其为异类,极力拒绝他,排斥他,迫害他。但具有文化独立意识的斯诺相信他根据客观事实而做出的判断,围绕红色文化积极展开工作,把自己的美国文化和中国的新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作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认识自己的独特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 [2] [美] 埃德加·斯诺. 斯诺文集: 1[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3] 孙再生. 近代文化思想与基督真理[M]. 台北: 宏智出版社, 1984.
- [4] [美] 埃德加·斯诺. 斯诺文集: 3[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5] [美] 伯纳德·托马斯. 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 [6] Thomas Bernard.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7] Snow, Edgar. Red China Today[M]. New York: Vantage Books, 1970.
- [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8[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车 英 于华东)

Probe into Edgar Snow's Course of Interculture

LIU 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Hong (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Guangx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culture communication.

Abstract: Edgar Snow's adventure is analysed in those yea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culture. There's much significance in his action that we can make use of intercommunion nowadays. As far as Snow, his interculture obtained many results that he even can't anticipate. Subjectively, it is not only satisfaction his adventure and curiosity but also promotion him to illustrious reporter at one swoop in the world. Objectively, it is not only fixing people's eyes upon the red culture from northwest zone to the whole nation and even the globe but also constructing the bridge of normal cultural intercommunion between China and USA in the future. And he become a cultural contributor from cultural absorber.

Key words: interculture; culture values; culture shock